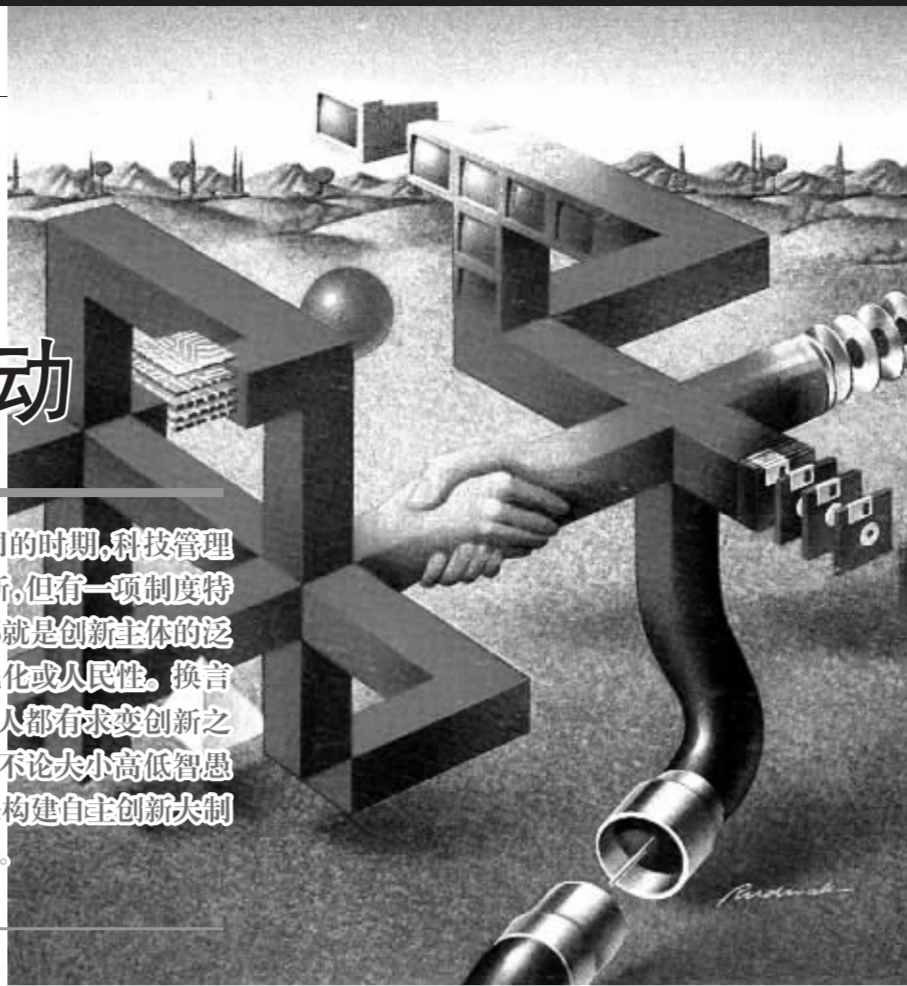


■郑国韶

# 让创新成为国民日常自觉行动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科技管理制度可以不同,可以创新,但有一项制度特别重要并具有普适性:那就是**创新主体的泛化,或曰创新战略的全民化或人民性**。换言之,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有求变创新之心,让每一个发明、创意不论大小高低智愚都有表现的机会,应当是**构建自主创新大制度、大环境的基本出发点**。

■内外

## 双城故事最新版最大悬念

——“我看国际金融中心”之二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曾有外国学者总结过,俄罗斯近300年的历史,大体上就是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两个城市之间的故事,而中国近150年的历史,大体上也可以说是北京与上海这两个城市间的故事。京沪关系,在中国诸多城市中确实最复杂最微妙。很多国家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都是分离的,如华盛顿与纽约、渥太华与多伦多、柏林与法兰克福。但也有一些国家的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合二为一,如伦敦、东京与巴黎。京沪之间错综复杂的核心在于,上海想成为纽约、多伦多或法兰克福,但北京却不甘心只当华盛顿、渥太华或柏林。

北京市政府在5月6日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尽管北京中国金融服务中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向记者表示,北京是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非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要与哪个城市进行PK,也不是要打击和削弱其他城市”。但是人们很难区分“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微言大义。

就市场与交易角度而言,上海占据着明显竞争优势。首先,中国最重要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最重要的期货市场——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最重要的货币市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中国最重要的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均位于上海。而根据国际

经验,但凡拥有重要金融市场的城市,都无一不是金融中心;其次,诚如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所言,“上海已经形成了以资本、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交易、再保险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而缺乏成熟的、多层次的现代金融市场,则一直是北京的最大软肋;再次,上海也是大多数外国金融机构理想的总部所在地。例如,第一批获准在中国当地注册成立法人银行的9家外资银行全部选择了上海作为其公司总部。

但是与纽约相比,上海的最大困惑,在于金融决策与监管机构均不在本地。虽然美联储总部设在华盛顿,但纽约联储却在全美12家大区联储银行中占据着唯我独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美联储总部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而纽约联储负责金融机构的监管。2005年,央行在上海成立了第二总部,在职能分配上似乎想仿效美联储模式。但就当前运行状况而言,上海央行二部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还远没有达到纽约联储那样的地位。

此外,虽然上海拥有证券交易所,但制定上市政策、负责上市审核以及实施上市公司监管的重要机构——中国证监会却位于北京。所有试图上市的中国公司老总及其保荐人,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赴京“跑证监会”。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总部也位于华盛顿,但美国上市公司在上市前只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报(Registration),而不必获得“核准”。决定公司能否上市的生杀大权,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和NASDAQ。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证监会和保监会。

上海的劣势恰好是北京的最大优势。北京汇聚着中国几乎所有的金融决策与监管机构,同时也是四大大

有商业银行以及三大政策性银行的总部所在地。此外,100多家中央直属企业(央企)的总部也位于北京,这些央企在内地资本市场甚至香港资本市场中扮演着绝对意义上的主角。几乎所有的金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都出自北京的“金融街”——一块位于北京阜成门与复兴门之间的方寸之地。为了更快地获悉金融政策的动向,更加方便地与政策制定者进行沟通,很多国内金融机构将总部设在北京。而一些业务开展与金融政策结合得更紧密的金融机构,例如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法国兴业银行等,这些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比重较高,均选择北京作为总部所在地。

此外,针对北京缺乏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劣势,北京政府正致力于推动各种新兴金融市场的建设。今年1月,北京石油交易所正式成立。此外,北京市还试图将北京产权交易所拓展为全国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建立全国棉花电子交易市场,以及股权转让的OTC市场。在人才方面,京沪均汇聚了大批国内顶尖金融人才。吸引国际金融人才的制度建设,上海目前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发布之后,北京在金融方面的税收减免、购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正在迎头赶上。

金融街与陆家嘴,体现了两种不同的金融中心建设思路。前者是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为基础,后者是以交易与市场为基础。两个城市都有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合理性。然而一国的金融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京沪在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如何分工与合作,要比如何竞争更为重要。

中国并不需要处处雷同、完全竞争的“双中心”,而是需要相互补充、完美合作的“双城记”。

■一言难尽

# 粮食空前丰裕, 可马尔萨斯幽灵重现!



傅勇  
经济学博士 财经专栏作者

或许,马尔萨斯的幽灵正以另一种变体重现地球。

近两年间,国际米价和小麦价格已然翻倍甚至上涨了三倍。粮价暴涨相继在喀麦隆、塞内加尔、菲律宾和埃及等37个国家和地区引发抗议和骚乱,食品骚乱让海地且急迫的面临着下台的危险。高企的粮价正在成为真正的杀手。世界银行警告,全球超过一亿人口面临因高粮价而陷入赤贫。

1798年,马尔萨斯出版了小册子《人口论》。书中悲观的结论在人口和食物两者增长速度的差异上展开:人口增长没有限制,而食物增长受制于土地有限性;或者说,人口按几何基数增长,而食物按算术基数增长。结果,人类必须依靠“积极的矫正”来让人口增长和食物增长重新回到平衡。这些矫正的手段包括,饥荒、疾病和战争。这些残酷的手段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口数量和养活他们的粮食的数量相匹配。

在1803年的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引入了道德限制,弱化了其最初的残酷判断。道德限制是通过降低出生率而不是此前强调的提高死亡率来起作用。如果人类推迟结婚并生育更少的小孩,人口和食物供给之间的张力也会得以缓解。这些道德限制被马尔萨斯称为“防御性矫正”。

如果马尔萨斯是正确的,那么对于现在因粮食而起的动乱和人道主义灾难,我们也只好一声叹息,无计可施。然而,马尔萨斯的幽灵只属于工业革命之前的丛林世界。当马尔萨斯写作《人口论》时,他忽视了已在英国发生的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即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蕴涵的技术革新,推动了生产的空前发展,人类养活自己的能力远远超越了算术基数增长。马尔萨斯的结论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艰苦挣扎的一个悲观总结。而马尔萨斯的人口预言也不成立。从欧洲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经历了人口结构的转变。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大幅下降,并且,人口增长最终在一些国家开始下降。

但无论如何,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在粮食空前丰裕的背景下,饥饿和争夺会在贫穷国家蔓延,在富裕国家引起抗议。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2007年国际谷物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1.08亿吨,并在2008年将创下21.64亿吨的历史新高。其中大米产量将增加730万吨,小麦产量增长4100万吨。既然,近年世界粮食产量处于历史峰值,为何全世界有大规模人口正不断陷入饥荒,遭受食物危机呢?

问题不在于马尔萨斯所论证的粮食的相对匮乏,而在于政治方面,在于国际粮食市场的紊乱,在于人类之间的不信任。这有点类似于凯恩斯所说的“富裕中的贫困”。

当有多个政府参与博弈的时候,事情常常会变得更糟,粮食危机的逻辑是这样。因无法控制海湾局势,美国等少数国家不得不另辟蹊径以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因而通过法案对用粮食生产乙醇等生物燃料进行补贴,这种非正常需求非但未能改变油价高企的现状,却将粮价打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粮食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对国际粮食市场的破坏却是巨大的。粮食的“创新”用途让人们看到一个无底洞:原来还能够变成SUV的燃料,那粮食问题不仅是人与人之争的问题,还是人与机器之争的问题了。

在美国,“机器吃粮”的时代已初露端倪,有五分之一的玉米作物用于乙醇生产;而在欧洲,一些菜子油被用作生物柴油。显然,这些政策诱导农民将大量耕地从小麦种植转向了玉米、大豆和油菜子的生产。欧美人也许会问,制作生物燃料不是问题所在,因为,国际小麦产量从2006年的5.965亿吨上升到了2008年的大约6.473亿吨。另外,由于种植条件悬殊,玉米制乙醇也不会导致大米的减产。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粮食市场原有的脆弱平衡被打破了。去年,全球被用作生产燃料的粮食超过1亿吨。恰恰是这1亿吨,打破了世界粮食市场维持多年供需平衡关系。2007年,全球粮食储备总量已经下跌到3.09亿吨,仅仅相当于54天的全球消费量,而1999年全球粮食储备水平相当于115天的全球消费量。

预期更悲观。据美国最新的《能源法案》,到2022年美国生物能源使用量将达到360亿加仑。有分析称,也许美国通过玉米提炼出的乙醇量能为其节省的汽油不到当年存储量的1%,却让全球粮价上涨了近四成。

起初,生物燃料问题引起粮价开始攀升,随即引发了市场恐慌、出口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商品期货的投机行为,这些因素使价格飙升愈演愈烈。为了保护本国消费者免受世界价格高涨的影响,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大米和小麦出口提高了管制,这些国家包括了阿根廷、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乌克兰、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

粮食出口管制正在全球流行,而出口管制导致可供国际贸易的大米和小麦数量减少。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2008年世界大米贸易量将从2007年的3470万吨减少到2870万吨,小麦贸易则从1.13亿吨减少到1.06亿吨。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出口管制,粮食贸易最后的实际降幅可能更大。在全球粮食获得历史性大丰收的背景下,若无这些限制措施,谷物贸易的萎缩和粮价暴涨就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马尔萨斯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最为讽刺的是,在全球谷物产量将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值的今年,却有更多的人在挨饿。马尔萨斯变体幽灵似乎又在地球上空徘徊。

今天的人们该如何赶走这个幽灵呢?

达,那就是“人,只有人,才是创造创新的根本动力”。人,是生产力同时也是科技生产力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这个“人”,不仅包括精英人才,也包括普通人。只要人有求变之心,都可成为创新的主体或动力,都可能因创新有成而成为不可替代的人才。因此,制度的设计可有不同,但是,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有求变创新之心,让每一个发明、创意不论大小高低智愚都有表现的机会,应当是构建大制度、大环境的基本出发点。天才毕竟难得,人才是在创新实践中培养造就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宏伟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主要是靠培养来造就的。在民众获得了适宜创新求变的环境制度的基础之上,就必能涌现相当数量的成功者或人才。中国有如此庞大智商不俗的人口,哪怕是小小的成才概率,也将积成一个巨大的绝对数。在此意义上,制度可以造就人才,可以自动地促成人才。比起专业的培训教育造就人才,它具有更大的经济性和更深刻的战略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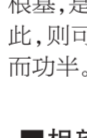
当然,制度创新是有其难度的。君不见中国改革三十年了,至今离建设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仍有许多关键需要攻坚突破。因此,为了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体系、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决策协调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与此同时,还要从文化创新入手激励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倡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激发国人的创新激情和活力。这样一种文化或文化氛围的创造,应当比制度变革相对容易操作,比较易于见效。东邻日本有一档名为“超级变、变、变”的大众创意表演电视节目,日本普通男女老少国民或个别群体穷极想象用廉价材料设计、表演各种出人意料创意甚至令人捧腹,但表演者和评论家一个个认真敬重之态令人肃然起敬。这不就是特别崇拜传统文化在日本在营造全社会的创新文化氛围吗?而这种培育,与韩国、以色列等国一样,是植根于大批普通民众的激情、真诚投入的广阔社会基础之上的。

国民的广泛自觉参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创新发展的最深厚根基,是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舍此,则可能走偏了方向、终至事倍而功半。

■相望江湖

## 日本信用档案就是如此厉害

——漫走早稻田之十六



陈宇鑫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Y君是我在早大比较谈得来的一个日本朋友。他的汉语说得非常溜,尽管有时候说起来有点文绉绉,偏书面化,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功底。他的本科和硕士都在北京大学完成的,博士阶段先在中国社科院政治所一位老先生那里攻读,后来回到早稻田大学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在中国十年,Y君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都已经相当中国化了。据Y君自己说,在日本读博士要比在中国难得多,每年三十来个博士生进来之后,5年之后能正常获得学位毕业的也就寥寥可数的一两个人而已,连续几年没人毕业都很平常。日本人早已熟悉了早稻田大学这一约定俗成的严格筛选标准,很多到早大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尽管很努力读书,但都已经做好毕不了业的准备。而且,用人单位也大体明白这里的规则,习以为常,所以虽很多人没法毕业,但仍能在其他大学找到一份教职。

我没有认真考证过他说的这个难度,但是,我每次在晚上十二点回家的路上都能看到他办公室仍亮着灯。尽管他家离学校也就是半个小时的地铁路程,但他的衣食起居基本上

都在办公室,就连节假日也是如此。有时候,Y君在空闲时间会到隔壁的办公室找我聊上几句,也会把一些他在写的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论文给我看,比如国防生制度、八荣八耻观等。有些非常细化的小问题和正出现的新问题,甚至连我自己也弄不太清楚。

不过,真正让我开始了解Y君的是我临别东京之际,在路上他和我的一番交谈。

离别之前,自然有不少的事情要处理。由于2006年刚去东京的时候就为了保险起见,办公室让我们同时办理了邮政卡和东京三菱-UFJ银行卡。邮政卡因为还有后续性的事宜仍需保留,但东京三菱-UFJ银行卡已不需要了,得去注销。可由于我在日本期间一直也不愿学日语,此时去办事可就傻眼了。刚好此时遇到正要离开的Y君,马上热情地带我去周边的东京三菱-UFJ银行去办理。说实话,来日本那么久了,很少遇到有那么主动、那么热心肠的日本人。

沿着早大西門小巷直去就有一个东京三菱-UFJ银行营业部,但可惜这个业务没有办法在终端POS机上处理。Y君说,他出国很多年了,对

日本的情况也有点隔膜,就打了个电话问问他妈妈应该怎么办。他妈妈告诉他,需要到人工服务的分理银行办理,最近的营业部可能就在高田马场附近,大约还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眼看已经是一点多了,银行很快就要关门。而第二天早上我就要离开东京,所以必须在三点下班之前全部办理完才行。情急之下,Y君说,你坐我的自行车,我搭你一起去吧!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这在北京都是不允许的哦!Y君说,没关系,日本警察很少,也很少会来查的。于是,我就坐了上去。但没想到,Y君所谓的很少警察恰恰就遇到了。停下车后,警察很礼貌地说,他需核查一下Y君的证件。折腾了十来分钟之后,警察让我们走了,并提醒我们不要再骑车带人了。Y君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应该只要几分钟就能解决的,但他的事情比较麻烦,所以耽擱了一点时间。

原来,他回国之后有件一直让他苦恼的事情。

事情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回国不久的一个晚上,Y君从办公室学习完准备回家,因为第二天是他母亲的生日,他必须赶回家给妈妈过个久违的生日。可当时早过了地铁和公交车末班营运时间,而在东京打出租车是那么贵,没有特殊情况,大家一般不会考虑,更何况Y君这样的穷书生。刚好,办公楼下有很多自行车是没有加锁的,他就顺手推出一辆往

为了尽快改变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优秀人才不足的局面以加快缩小我国科技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对今日中国有极大且急迫的必要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创新转化为尽可能多的国民群体的主观愿望和自觉行动,使整个民族和国家充满强劲的创新激情并涌现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近期看到的两则近邻的消息或许可以给我们不小的启示:创新人人重视,各有巧妙不相同,关键的要素与制度和文化的紧密相关。

前一则消息说,上任不久的韩国新总统李明博撤了国家科技部以及分管科技的副总理,而设立这个机构和职位,正是韩国当年为贯彻“科技立国”战略而采取的重大措施。据说,科技部的一部分职能,此后归入教育部行使。

这个消息令人至少顿生两点困惑:其一,既然如此重视科技工作,理应增设或强化相应机构配置足够人力、财力、物力作为推动工作的“抓手”才行,怎么能反其道而行之大举裁撤政府专门机构呢?其二,如此一撤,从副总理到部长、副部长、司局长……一大群高级干部不就成了要下岗的冗员,如果分流安置不当,岂非成了影响稳定的消极因素?想想李明博本人曾以技术、管理创新闻名而高升至韩国科技巨擘三星集团掌门人,总不至于对国家科技管理机构如此轻视厌恶吧?

后一条新闻更有点吓人,其标题引自三星集团前主席李健熙的原话:“除了老婆孩子,什么都可以改变!”说的是在韩国,从政府到民间,从团体到个人,从总统到家庭主妇,从科技、文化、管理到社会生活,创新求变,已成社会风尚、行为习惯、组织形态乃至生存发展之本,形成了开放性的全社会创新体系。变,成了常态,而不不变,只是老婆孩子这种特定的亲缘血缘关系了!

两条消息相连比照,这才让人品味出味道来:原来,韩国这次裁撤行动绝非一时兴起的草率作为。韩国人现在是把支持科技的国家战略和资源化解到了教育领域,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教与学从根本上享受科技资源的滋养和支持,从提高国民知识素养上为科技立国培植人力、人才和智力之基。正如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某部长所言,所有这些变化源自韩国科技创新的“全社会经营战略”。在这种战略动员下,创新思维,创新求变,已成国民、企业、社团、政府的自觉行动。当创新成了国民日常行为方式时,科技部的确有休息的必要了。

常听人说,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弊端甚多,不胜枚举。最集中的表现为投入年年增长,产出特别是原始创新、发明创造成效低下,为了图名求利,甚至弄虚作假。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未能如期如愿实现。有声音直指计划经济时代遗留未经根本改造的现行科技管理体制是百弊之源。

那么,韩国整改科技体制的大举动的借鉴意义在哪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再看一看以色列的实例。弹丸之地的以色列却是举世闻名的科技创新“失国”,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安全存续,犹太人把超群的智慧投入科技创新的所有前端尖端,其成果之丰盛与创新之效率,举世罕有其匹。但是以色列有科技部,而且在全国科技资源统筹协调中发挥着统筹协调作用。而以以色列与韩国有一点相同:即创新的社动员极其深入。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并深怀危机意识的以色列公民,把民族国家的创新图存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并化作自觉行动了。

由此看来,就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的环境而言,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科技管理制度可以不同,可以创新,但有一项制度特别重要并具有普适性:那就是创新主体的泛化,或曰创新战略的全民化或人民性。这里,笔者想套用一句经典话语来表